

# 火野葦平與日據時期在台日人的戰爭書寫

林慧君

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中文摘要

本文從法西斯主義的戰爭美學化觀點，比較火野葦平戰記文學《麥田與士兵》（麥と兵隊）與在台日人作家的戰爭小說。相較於火野葦平實戰經驗所展現的紀實體文學，在台日人作家以台灣為審美對象，對台灣之外占領區的描寫反映了殖民地觀點外，這一類殖民地的戰爭書寫顯示出決戰體制下文學標準受日本中央文壇遙控。為探討台灣文壇與日本中央文壇的關聯，本文從內地作家的殖民地現身、文本的殖民地翻譯，到官方、媒體的操控與讀者的反應，將在台日人的戰爭小說放在帝國戰爭文學發展脈絡中觀察，進而思考帝國與殖民地日人作家高度扞從統治機構所產生的文學審美化策略，朝向傳播日本精神和回歸文化傳統的國策論述發展情形。

關鍵詞：日據時期小說、戰爭小說、在台日人、火野葦平、法西斯美學

# **Hino Ashihei and war-time writing by Japanese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Lin, Hui-chun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fascist aestheticization of war to compare Hino Ashihei's wartime literature *Wheat and Soldiers* and war novels of Japanese authors in Taiwan. Compared to the realist literature expressed through the actual war experiences of Hino Ashihei, Japanese authors in Taiwan use Taiwan as an aesthetic object. Writings about places outside of Taiwan not only reflect the colonial perspective, but this type of wartime colonial writing reflects the fact that literary standards in a decisive war system were being remotely controlled by the central literary field in Japa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aiwanese literary arena and the Japanese literary arena, this article observes the colonial appearance of Japanese authors, the colonial translation of texts, to official and media manipulation, and to reader responses, by placing the wartime novels of Japanese in Taiwa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imperial war literature. In turn,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literary aestheticization produced by the high degree of compliance of Japanese writers the colonies toward the ruling institutions, and approaches the national strategy

development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Japanese spirit and return to the cultural tradition.

**Key words:** Novels under Japanese rule, war novels, Japanese in Taiwan, Hino Ashihei, Fascist aesthetics

# 火野葦平與日據時期在台日人的 戰爭書寫<sup>1</sup>

## 一、前言

以日據時期在台日人新文學為研究對象，不論是研究面向或研究方法上日見開展，但在作家作品比較研究上，尤其是殖民時期宗主國文壇對在台日人文學的影響層面，仍存在著待彌補的空隙。決戰時期在台日人作家如何寫作歌頌鼓舞戰爭的作品？這些扈從統治機構生產的戰爭文學，不單只是作為戰爭宣傳的文字，從戰爭經驗、戰爭記憶的描述，到對戰場的想像，在台日人逐步邁向和日本內地文學同步的目標，以融合了日本傳統與西方法西斯的美學觀，用以激發國民高貴的愛國心，共同為戰爭期日本文化建設效力。

本文嘗試以日本「內地」作家火野葦平的主要戰記文學《麥田與士兵》（*麥と兵隊*）作為當時國體論下的戰爭美學標準，以觀察日據時期新文學雜誌《文藝臺灣》、《臺灣文學》、《臺灣文藝》（臺灣文學奉公會）中在台日人的戰爭描寫，探討殖民時期宗主國文壇對在台日人文學的影響，考察殖民地作家在迎合政治統合與檢閱制度的寫作標準下所呈現的殖民地特色，以及在戰爭文學的共同命題中，進一步觀察在帝國「外地文學」的語境下，戰爭文學書寫如何向「大東亞文學」邁進，進而了解殖民者文學作品的時代意義。

<sup>1</sup>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之研究計畫〈火野葦平與日據時期在台日人的戰爭小說〉（NSC100-2410-H-255-002-）之部分成果，承蒙補助，謹此致謝。

## 二、戰時體制與戰爭文學

日本在 1937 年後，因應戰局展開的政治、軍事與文化等政策，限制了文學表現的內容幅度。翌年〈國家總動員法〉的實施，國民一切生活均受政府嚴格統制，一步一步完成法西斯體制，政治、經濟、教育及文化傾向於軍事價值的思想及行動方式。文化統制藉由檢閱制度逐步強化，不利戰爭的作品遭當局嚴重干預打壓，不但嚴禁發表批判或反省戰爭的作品<sup>2</sup>，作家還需配合統治機構生產戰爭文學。

火野葦平於 1938 年發表報導徐州會戰的《麥田與士兵》，描寫為聖戰捨生忘死的日軍艱苦哀歡的姿態，在日本引起大後方讀者很大的回響，為軍方、媒體塑造成軍人作家、國民英雄，為戰爭宣傳發揮了最大的影響力，戰爭文學的質與方向也因此確立，為文學者揭示了符合軍方檢閱要求的模範之作。頂著芥川獎光環，以親臨戰場的第一手經驗，加上軍方操控與媒體宣傳，火野的《麥田與士兵》成為 1937 年進入總動員體制以來協力文學的代表作<sup>3</sup>。

許多日本作家陸續被派到中國大陸戰場，報導皇軍奮勇戰鬥與建設占領地的情形，即所謂的「筆部隊」。無批判、無反省的戰爭文學逐漸成為日本文壇主流<sup>4</sup>。在軍國主義社會中，合理的批判精神遭壓制，灌輸國民無條件而絕對服從的精神，以軍隊化組織鼓舞群眾，文學也無法逃脫軍國主義傾向，顯示出戰爭期文學的封閉性與虛幻性。

1939 年 9 月 17 日火野葦平從日本經由台灣赴大陸時，在台灣停留一週，參加由台灣日日新報社主辦、台灣總督府資助的「時局・南支展」籌備會，完

<sup>2</sup> 1937 年至 1938 年間，日本內務省針對電影業發布了幾項禁令，內容也可推測當時文學書寫的限制，包括：不准誇大表現與戰爭有關的場景；不准表現近距離的戰鬥場景；不准降低士氣和破壞被徵軍人及其家屬的戰鬥精神；特別要表現日本本土家庭制度的完美和為國家犧牲的精神……。轉引自李建璋，〈戰時體制下之木下惠介《陸軍》（1944）及（反）現代性之理論：美學與歷史關係〉（台南：台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頁 102。

<sup>3</sup> 1938 年 10 月 9 日《読売新聞》，《麥と兵隊》的廣告「國民精神總動員！全國民は必讀せよ」。轉引自蒲豊彦，〈一九三八年の漢口（四）火野葦平と石川達三〉，《言語文化論叢》第 5 期（2011 年 8 月），頁 30。

<sup>4</sup> 本段參考市古貞次編，〈戦争と文学〉，《日本文学全史》第 6 卷（東京：學燈社，1994 年），頁 258-267；紅野敏郎、三好行雄等編，〈戦争下の文学〉，《昭和の文学》（東京：有斐閣，1992 年），頁 157-159。

成〈路過華麗島〉(華麗島を過ぎて)一文，12月刊載於西川滿主編的新詩雜誌《華麗島》創刊號的卷首，作為祝賀文的形式，期許首次結合台灣全島詩人而誕生的《華麗島》雜誌能大放異彩。中島利郎指出西川滿藉內地文壇暢銷作家名氣擴大影響，以順利將「臺灣詩人協會」改組成「臺灣文藝家協會」<sup>5</sup>。以日本國內文壇作家的名氣結合「文學報國」的國策實踐，透露了西川滿等在台日人的文學活動方向。

《麥田與士兵》出版後，翌年林荊南將其中描寫激烈戰況的〈血戰孫圻城〉譯成中文，連載於《風月報》第103號至第111號(1940年2月至6月)，在「譯者的話」中推崇火野葦平是一位文壇戰士，《麥田與士兵》則是現代戰爭文學首席，譯者希望藉此作的翻譯「使六百萬的島民，一致協力，固守南方國防，成為完成興亞大業的一份子。」<sup>6</sup>通俗大眾刊物譯介火野的戰爭文學，不但具時效性，且聚焦在大眾國民化與戰爭協助的功能上。

1940年，日本將戰局從中國擴大到東南亞，繼「大政翼贊會」思想文化戰線建立後，「日本文藝中央會」更統合組織全國文壇，國家統制文化的力量日益增強。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國內發布了言論、出版、集會與結社等臨時取締法，並召開「文學者愛國大會」、「評論家愛國大會」等<sup>7</sup>，文學活動被整編到法西斯化新體制中。

殖民地文學的統合，日本文藝家協會於1940年12月派遣作家菊池寬、久米正雄、火野葦平、吉川英治、中野實等人到台灣來，在總督府的後援下，於台北、高雄、台南、新竹等城市進行演講。火野葦平此行以退役軍人身分來台，以〈回到內地〉(内地に帰って)為題發表演說，從前線士兵的惡戰苦鬥現況，指出後方國民生活逸樂的不當<sup>8</sup>。

<sup>5</sup>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研究——日本人作家的抬頭——西川滿と「台灣詩人協會」の成立〉，《岐阜聖徳学園大學紀要・外国語学部編》第44集(2005年2月)，頁48-50。1943年9月的《文藝臺灣》6卷5號以火野葦平繪有菸管的問候函為雜誌封面，再次顯示內地作家資本部分轉移至外地文學雜誌。

<sup>6</sup> 荊南，「譯者的話」，《風月報》第103號(1940年2月)，頁12。

<sup>7</sup> 參考櫻本富雄，《日本文學報国会——大東亞戰爭下の文學者たち》(東京：青木書店，1995年)，頁5-20。

<sup>8</sup> 〈回到內地〉(内地に帰って)，《臺灣日日新報》第14644號，1940年12月17日，第3版。

因此，竭力鼓舞後方士氣，致力於填補大後方與前線對戰爭體認的落差，以實現解放與團結亞洲民族、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成為火野戰爭文學發展的精神基礎。火葦以戰地歸來的榮耀與使命，持續為戰爭文學效命，也成為日後「南方徵用作家」的一員，與戰爭相關的素材當道，戰爭文學逐漸成為戰時日本文壇主流。

日本文學界的作家總動員法西斯體制，對台灣文壇也有所影響。1941年2月成立的新「臺灣文藝家協會」，以台北帝大教授群為中心，總督府高官、情報部事務官也名列其中，顯示總督府情報部開始介入文學界<sup>9</sup>。1942年日本成立「文學報國會」，目的在「結集日本文學者的全力，確立彰顯皇國傳統與理想的日本文學，以翼贊宣揚皇道文化」<sup>10</sup>。同年11月於東京舉行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統合了日本帝國統治下的亞洲各殖民地的知識分子，加強對大東亞聖戰的認同。台灣派遣西川滿、濱田隼雄、龍瑛宗、張文環出席。這次會議對在台日人的影響明顯，濱田隼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の成果〉中提到：

在此，完美定下嶄新的大東亞文學的目標，並且，文學者更應以刺激大東亞精神與生產，驅使人們迎向明日奮戰的文學，植下日本必勝信念鼓舞打仗的文學，亦即具體呈現在戰鬥文學和娛樂文學中，為作為獻身完成戰爭的文化戰尖兵而感到自豪與自覺。<sup>11</sup>

至此，台灣的文學不論名之為地方文學或外地文學，只有「鼓舞打仗的文學」、「戰鬥文學」才是當局所樂觀其成的，而在台日人以寫作歌頌鼓舞戰爭的作品，逐步邁向和日本內地文學同步的目標。

1943年2月「日本文學報國會」派遣作家戶川貞雄、丹羽文雄、庄司總一來台，與皇民奉公會台北支會舉行「文學報國演講會」。同年4月總督府成立「臺灣文學奉公會」，致力推動皇民文學，新「臺灣文藝家協會」同時宣布解散，台、日作家皆歸「臺灣文學奉公會」所屬，完成了決戰下「文學報國」的動員

<sup>9</sup> 參考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1年），頁88-95、230-231。

<sup>10</sup> 轉引自櫻本富雄，〈日本文學報國會定款〉，同註7，頁81。

<sup>11</sup> 濱田隼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の成果〉，《臺灣文學》3卷1號（1943年1月），頁64-65。

體制。6月「日本文學報國會臺灣支部」成立，推派長崎浩、齋藤勇、楊雲萍、周金波參加8月在東京舉行的第二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11月由「臺灣文學奉公會」主辦，總督府情報課、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和日本文學報國會等單位協辦，在台北市公會堂舉行「臺灣決戰文學會議」，集結了全台六十多位文人，以「確立本島文學決戰態勢」與「文學者的協力戰爭」為主要議題。會中由於西川滿公開獻出《文藝臺灣》，作為將文藝雜誌納入「戰鬥配置」的示範，翌年文藝雜誌被合併，取而代之的是1944年5月創刊的皇民奉公會的機關誌《臺灣文藝》<sup>12</sup>。

從帝國中央到殖民地，在決戰體制化下，在台日人作家在文壇總動員下書寫國策文學，發表在總督府統合的宣傳媒體，表現了作家對大東亞戰爭的肯定與支持。從政策到文本政治化，這一類殖民地的「戰爭文學」，顯示決戰體制下文學的標準受日本中央文壇的遙控，台灣文壇與日本中央文壇的關聯，從內地作家的殖民地現身、文本的殖民地翻譯，到官方、媒體的操控與讀者的反應，雖未能直接證明火野葦平對殖民地台灣文壇的影響，但從在台日人戰爭小說展現的審美觀來看，可與火野葦平的戰爭文學互相印證。

### 三、《麥田與士兵》的戰爭美學

火野葦平於1938年3月出征中，因〈糞尿譚〉獲得第6回芥川獎，並空前的在杭州戰場受獎。後轉入上海「中支那派遣軍報道部」，以軍報道部員身分參加徐州會戰。是年8月，以一個戰爭觀察者的角度於日本《改造》雜誌發表報導徐州會戰的日記體長篇小說《麥田與士兵》，副標題為「徐州會戰從軍日記」，描寫為「聖戰」捨生忘死的日軍艱苦哀歡的姿態。尤其對下級士兵戰地生活中食衣住行的描寫與心理的刻劃，以及對中國庶民生活情狀的報告，表現出同時期媒體與戰爭文學視野所未曾觸及的作風。作品在雜誌連載時並加上日本軍方的宣傳單、作家筆記，以及數十張軍方拍攝的相片，如中國人民的樣貌、士兵

<sup>12</sup> 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4年），頁144-148。

們在戰場上生活模樣等，圖文並茂的魅力，滿足了當時日本國內媒體、讀者的需求，尤其能稍解出征士兵家屬的緊張與不安心情，當時引起日本國民很大回響<sup>13</sup>。今人河田和子分析指出，火野紀錄「我」在戰場九死一生的心情，卻和周圍士兵的心情相契合，亦即作為士兵的「我」成了無數日本士兵的代言者，而為大後方的讀者共有共享<sup>14</sup>。文本中其缺乏個別性刻劃的士兵形象，以及與整體戰況發展無太大關聯的細部描寫，型塑出理想順從的好國民形象，正符合了軍部的模範性訴求。

乘此國民人氣，火野葦平 1938 年 11 月於《文藝春秋》發表以杭州灣登陸為題材的《土與士兵》（土と兵隊）；1938 年 12 月至翌年 6 月於《朝日新聞》發表以杭州警備留守為題材的《花與士兵》（花と兵隊）。此三書後來以《兵隊三部作》（1939 年 8-11 月）總名出版單行本，1939 年 5 月也出版《海南島記》等。其中《麥田與士兵》發行了一百二十萬冊，成為當時最暢銷的書，歐美各國有英、德、法譯本，1938 年 12 月上海、1939 年 1 月「滿洲國新京」也分別出版不同政治立場下的中譯本，在當時成了一部不分敵友、廣泛流傳的文本。

日軍在中國戰場遭遇了什麼，又對中國人民做了什麼，在中國戰爭現場的軍中作家火野的系列作品，對於同時代不同地區的讀者皆產生吸引力。加上《土與士兵》改編成電影公開上映（台灣於 1939 年 11 月 2 日上映<sup>15</sup>），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火野葦平的作品雖然缺乏深刻的思想性，但在在顯示出對戰爭努力付出的肯定態度，為戰爭宣傳發揮了最大的影響力，可謂為戰爭期日本的媒體寵兒，作為連結前線與後方的重要媒介，也獲得日本廣大讀者的肯定，使得媒體得以發揮大眾國民化與戰爭動員的功能。

從戰爭小說的文學性而言，以戰爭生活為題材的戰爭小說，著重關注戰場上人面臨生死衝突的處境。陳思廣指出，戰爭小說的人物性格命運必須明顯地

<sup>13</sup> 花田俊典，〈火野葦平、戦争文学の誕生〉，《昭和文学研究》第 44 集（2002 年 3 月），頁 52-53；河田和子，〈報導戦線下における戦争の表象——火野葦平《麥と兵隊》の表現戦略〉，《昭和文学研究》第 45 集（2002 年 9 月），頁 60-61。

<sup>14</sup> 河田和子，同註 13，頁 65。

<sup>15</sup> 黃仁，〈日本電影在臺灣〉（台北：秀威資訊，2008 年），頁 459。1939 年 11 月退伍的火野葦平，11 月 3 日自廣東返回福岡，途中經過台灣時觀賞了《土と兵隊》的電影，參考池田浩士，《火野葦平論》（東京：インパクト出版会，2000 年），頁 202。

受到了已然戰爭影響，戰爭的主體是軍人，除了具備其他題材小說所應有豐富多樣的人物性格外，還應具備作為戰爭主體的規定性，面對戰爭本身、敵方，軍人如何依自身能力條件進行判斷，以確定目標來從事軍事活動，在人同戰爭的相互作用中表現出來的自覺能動性、自為超越性和自主創造性，以顯示軍人形象的藝術魅力<sup>16</sup>。

然而日本傳統的戰爭美是表現在對滅己為國的精神崇拜，明治以來的國民心理潛在著為國奉獻的理所當然信念<sup>17</sup>，出現在火野小說中的士兵是作為團體的性格來描寫，並且以一種理想的日本士兵形象來刻劃，意圖發揮總力戰體制下文學教化與動員國民的功能。日本軍方的檢閱制度限制了作家的寫作自由，火野葦平《麥田與士兵》初刊時約有二十七處文字遭隱諱或刪削，依火野戰後回想，當時書寫內容有以下限制<sup>18</sup>：

- 1、不得寫日軍打敗仗的狀況
- 2、不得寫戰爭的陰暗面
- 3、敵方一律是可憎的
- 4、不准寫作戰的全貌
- 5、不可寫出部隊的組織與名稱
- 6、不准描寫軍人的品格、「分隊長以下的士兵可以描寫性格，小隊長以上全部是人格高潔、沉著勇敢。」
- 7、不准寫女人

來自軍部的重重限制，除了保密需要外，文學一步步向軍事價值體系靠攏。作為「戰爭文學」代表的《麥田與士兵》，敵我雙方呈現不均衡、非互動性偏斜的描寫，在日軍所到之處「所向無敵」的寫作要求下，書中人物性格扁平，形成一種不偏離理想的人物個性。後藤康二指出火野在這些限制下展現出「在遼闊

<sup>16</sup> 陳思廣，《戰爭本體的藝術轉化——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戰爭小說創作論》（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頁16-17、155-157。

<sup>17</sup> ビーター B. ハーイ，《帝國と銀幕》（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1年），頁28。

<sup>18</sup> 轉引自河田和子，同註13，頁57-58。

的中國麥田中行進的日本軍的美與崇高」<sup>19</sup>。池田浩士認為火野面對戰鬥士兵們個別具體的姿態，能用等同於他們一樣高度的視角，且盡其可能使用不同於國策套語的話語加以刻劃<sup>20</sup>。而所謂的異於國策套語的話語，例如呈現士兵在戰場上猶如在母國平日職場飯後談笑般自在的形象（五月十日），將戰場上非日常的時空日常化的片斷式呈現。大後方對戰場上出征親人的思念呼喚等情意，也都在火野創作的考量之列，集中描寫令讀者安心的戰場情景，以及在其中活動的士兵們<sup>21</sup>。這種抒情化的謳歌煽惑了群眾的虛榮心，戰爭的意義只為打勝仗，戰爭的暴力與殘虐隱而不見。

《麥田與士兵》從「五月四日」上海出發，到「五月十六日」孫圩城激戰發生前，並未明顯見出日本士兵的戰鬥意志，呈現出「和平」進入中國領地救治中國百姓如既定任務般理所當然的氛圍；孫圩城戰役後，「我」以報導員身分在砲火中躲避槍彈、救治同袍等九死一生的經歷，令「我」感受到生命被「支那兵」威脅，因而由怒生恨，產生了奮勇殺敵的勇氣與決心，訴說著日本兵「被激怒」的心情：

在這裡所有的士兵，既是人子，也是故國有妻子的人夫，還是丟下幾個孩子來到此地的人父……並不是說為國捐軀是可惜的，但我怎麼也無法制止滿腔憤怒的感情。我想和士兵一起突擊，面對如此使我同胞受苦，且威脅我生命的支那兵，我強烈憎惡。（五月十六日）<sup>22</sup>

鳥海一郎於 1942 年出版的《戰爭與藝術的課題》（戦争と芸術の課題）中提出戰爭文學的良否取決於作家的態度，其寫作手法目的要在讀者心中烙下高貴優美的愛國心，否則反而會麻痺讀者的感情，恐變成無感的宣傳文學<sup>23</sup>。在中國戰場實際參與戰爭的火野，並不採直接以「正義」來修飾戰爭，或呼喊

<sup>19</sup> 後藤康二，〈《麥と兵隊》における個と類の問題〉，《近代文学研究》第 19 期（2002 年 5 月），頁 58。

<sup>20</sup> 池田浩士，同註 15，頁 191。

<sup>21</sup> 池田浩士，同註 15，頁 547、554。

<sup>22</sup> 本文引用火野葦平，《麥と兵隊》皆出自《日本の文学》第 51 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68 年），頁 308-399。中文為筆者自譯，以下皆同。本段引自頁 364。

<sup>23</sup> 鳥海一郎，《戦争と芸術の課題》（京都：教育圖書株式會社，1942 年），頁 217、232。

「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口號。在根深柢固的神國意識與天皇崇拜思想下，表現在作品中即以「臣民之道」衡量亞洲人民的「價值」，只問勝利不問戰爭是非的「侵略行為」，在「正義之戰」的大轟下，反轉為對頑強敵軍抵抗的憤怒，火野在對戰場上士兵以同理心反覆的陳述中，召喚了前線、後方人員的愛國意識。

因此，為什麼要打戰，為什麼要犧牲，諸如此類的反省或詰問，成了日本社會文化的禁忌。日本的戰爭宣傳強調國民的犧牲與榮譽的重要，以此要求全民一致支援戰爭，可說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響。火野與士兵生命共同體般的情感投入，達到了激發讀者愛國情操的「藝術效果」，被安田武視為庶民精神的代表<sup>24</sup>。這種強調精神魂魄的力量，美化戰爭的殘酷性質，並賦予崇高的形象，不論何種階級與行業（包括作家）都遭強制同質化，個人的情感被貶低剝奪，文學淪為動員大眾的工具，社會朝法西斯極權主義發展。

班雅明批判法西斯主義時以「政治美學化」名之，並以「戰爭」為政治美學化頂峰，戰場上武器作為人體的延伸、槍擊炮轟的氣味等交織而成的戰爭是「美麗」的<sup>25</sup>。戰爭成為一種藝術化的景觀，戰場是最閃亮的核心。戰場上種種侵略的殘酷的暴行掩藏在藝術靈光下，培養不論是非只求勝利的非理性思考。我們在《麥田與士兵》少見對敵人——「支那兵」的直接書寫，代之以麥田的意象貫穿全小說，廣大的麥田大地成了敵軍的隱喻。出了聚落盡是一望無際的麥田（五月八日），一棵棵出自中國農民之手的大麥、燕麥、小麥等「真正令人畏懼的麥田」（五月九日），軍隊行進在無盡的麥田中，「到哪裡風景都是一成不變的麥田」（五月九日），「無疑仍行進在如海的麥田中」（五月十二日），不論在丘陵或石山間，「無法逃出麥田」的圍繞（五月二十日），直到戰記結尾麥田中立起日本「日の丸」旗為止（五月二十一日）。花田俊典指出「士兵們的敵人其實不是支那兵，而是廣大的麥田大地」，成為火野書寫戰記的動力由

<sup>24</sup> 安田武，〈戦争文学の周辺——火野葦平論〉，《戦争文学論》（東京：勁草書房，1964年），頁202。

<sup>25</sup> 華特·班雅明著，許綺玲譯，〈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1998年），頁100-101。

來<sup>26</sup>。士兵取下的不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的戰場，而是富有生命力且遼闊無邊的麥田。

宣傳文學既是為戰爭服務的，作家文學奉公必然導向美化戰爭發展，戰場、個人和國家被視為如自然般融為一體，從對中國土地、自然風景的認同，到對中國農民的同情，戰爭對「貌似日本農民」（五月七日）的中國農民來說：

只是如農作物遭蝗災、水災、旱災般的災難。戰爭如風吹過後，他們又會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似的，嘴上雖嘮嘮叨叨，仍繼續在這土地上過活。  
（五月十日）（《麥田與士兵》，頁 333）

因為火野所選擇的中國百姓的說法是：日軍是有紀律、受歡迎的。雖然身在中國戰場，卻常有令「我」想起故鄉人事物的熟悉感，麥田的夜景、四處可見的農民、或短兵接戰中的「支那兵」，因為和日本人長得太像而困擾著「我」，而發出亞洲民族同血緣、同文同種、如鄰人般的感想（五月十四日）。

侵略戰爭被「正當化」後，血流漂杵的戰場在火野的眼中卻如詩般的景象：

滄河堤上躺滿了白日以來疲敝不已的士兵，頃刻便鼾聲四起。一隻螢火蟲飛起，漸行漸遠消失在彼岸。士兵沉睡在月光下的模樣令人感到無比的同情。面對著這情景，我和梅本君不約而同相視而笑……我們四個人像擠沙丁魚般塞進汽車裡，聽著忙碌的工兵隊嘈雜的聲音、打樁的聲響在樹林裡的回音，在美麗東洋滿月流射下如玻璃水族館般的箱子中不知不覺睡去。（五月十三日）（《麥田與士兵》，頁 345）

士兵為日本帝國拓土開疆大業戮力以赴的精神，透過火野深情如詩的眼，成了前線士兵與後方士兵家屬情感依附的橋樑，這種同情不是個人小我的感懷或不捨，而是一種妨礙人理性思考的崇高情感刺激，士兵和戰場、個人和國家如自然般融為一體，是法西斯美學的表現。

<sup>26</sup> 此觀點引自花田俊典，同註 13，頁 56、58。

在法西斯國家中，個人的價值依附在國家價值底下，人成為國家機器的部分，但火葦不諱言士兵也會疲累：

屋子裡眾多的士兵鋪著草蓆沉睡著。那熟睡中的模樣令人感到淒慘。那是結束了一個死鬪等待下一個死鬪如爛泥般的深眠。不知怎麼的令人難受。(五月十一日)(《麥田與士兵》，頁 336)

火野對士兵的同情與歌頌，在戰場生活化中每下愈況。長期餐風沐雨的行軍生活中，士兵們腳底都長著水泡，舊的水泡破了，再長出新的水泡，疼痛難耐也得走下去：「我很訝異自己能忍受並克服這種困苦……望著簡直是骯髒腐臭的士兵的腳，感到多麼尊貴。」(五月十五日)(《麥田與士兵》，頁 350) 面臨戰爭所引起的必然大量的死亡後果，日本戰爭文學透過將死亡、屍骨「崇高化」敘事，以消解人性尊嚴喪失的衝擊，並以此勾勒、渲染帝國的幻象<sup>27</sup>。戰爭是美麗的、富有生命力的：

我在石榴山丘上看著。在一片廣闊無際如海的麥田中，右手邊山腳下有部隊行進，左手邊也蜿蜒持續前進，中間也有長長的隊伍行進，朝向東方全新戰場，在烈日曝曬下、黃塵滾滾中，持續前進。我認為那是無與倫比的美麗風景。我感受到那進軍湧現堅強的力量，感受到強而有力的浪潮連綿不絕奔流著，我感覺到自己完全融入那莊嚴的脈動中……與祖國同行的士兵精神走在祖國之道，待到飲彈身亡埋骨在支那土地上的日子來臨時，我就只能想著所愛的祖國，想要高喊愛的祖國萬歲直到氣絕。我有如置放在這莊嚴脈動潮流中的一粒氣泡，站立在石榴山丘上。(五月十九日)(《麥田與士兵》，頁 388-390)

這種對戰死的崇高想像並不會引起日本讀者反感，反而展現了日本民族的心誠意識。正如潘乃德在《菊花與劍》評論日本軍國主義的宣傳電影中充滿戰爭的

<sup>27</sup> 坪井秀人，〈戦争短歌における前線と銃後——《支那事变歌集》その他〉，收於山口俊雄編，《日本近代文学と戦争——「十五年戦争」期に文学を通じて》(東京：三弥書店，2012年)，頁 88。

犧牲與苦難，像是單調的泥濘行軍、困戰的痛苦、勝負的難卜，或是在某些泥濘的中國小鎮夜宿的場景，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是最好的反戰宣傳。但對於日本觀眾而言，只要銀幕上所有的人都一清二楚的償報了「恩」（筆者註：指「皇恩」）就完足了<sup>28</sup>。個人在戰爭中感受到自己既渺小又壯大，生命既短促又悠長，戰爭成為個人自我超越的道場，藝術不單為戰爭服務，而是將戰爭藝術化，讀者嚮慕火野的藝術美，以崇高、莊嚴的修辭，遮蔽戰爭的破壞性與非人性部分。

蘇珊·桑塔格在〈迷人的法西斯〉評論納粹攝影師蘭妮·萊芬斯坦攝影集時提到：「法西斯主義——代表了很多今天混在別種名目下的理想：以生命為藝術，迷信美，盲目尊崇勇氣，棄絕理智，陷身群眾內以掩沒疏離。」<sup>29</sup>麻木、無知、順從與不抵抗，正是法西斯戰爭美學化所希望獲致的結果，日本傳統的集團觀念、國家觀念讓體制法西斯化，在國體論下的戰爭美學標準，個人與國家被視為一體，國家體制下是不允許流露個人情感的，因為會降低士氣和破壞出征軍人及其家屬的戰鬥精神，為提高士氣與戰鬥精神，定要強化犧牲、忠誠、獻身與勇敢等道德與榮譽的觀念，以達動員大眾的目的。

#### 四、在台日人小說中的戰爭書寫

以決戰時期新文學雜誌《文藝臺灣》、《臺灣文學》、《臺灣文藝》（臺灣文學奉公會）等所刊載的在台日人小說中的戰爭描寫來看，處在殖民地台灣的日人作家中，少數有從軍經驗者如濱田隼雄、川合三良等，也很難有火野葦平傳達戰場訊息的外在條件與內在力道。對於大部分沒有參戰經驗的作家，如何想像戰場、如何思考戰爭，以及如何定位自身在後方的責任與任務，是決戰時期作家不得不面對的文學報國議題。與戰爭相關的各種訊息促進了作家以戰爭材料加工敘事，而火野葦平以下士官身分書寫的《麥田與士兵》，不僅為前線的士兵代言，也為大後方的國民、士兵的親人們，傳達了戰場上的「皇軍」英姿，對

<sup>28</sup> 潘乃德著，黃道琳譯，《菊花與劍——日本民族的大化模式》（台北：桂冠圖書，1974年、1987年），頁176-177。

<sup>29</sup> 蘇珊·桑塔格著，廖思逸、陳耀成、姚君偉譯，〈迷人的法西斯〉，《土星座下》（台北：麥田出版，2007年），頁129。

當時文壇戰爭文學的寫作發揮了示範作用，確立了法西斯體制下戰爭文學的質與方向。

火野葦平由戰場回歸後的作為，成了在台日人小說中人物愛國意識的催發者，名和榮一〈給遙遠的母親〉（遑かなる母に）<sup>30</sup>中熱愛文學卻與母親處於衝突、不和的男主角美津造，因「北支事變」、「支那事變」等戰事，生活觀和文學觀更上一層樓，燃起了國民意識，放下憧憬通俗作家的不實想法，決定以筆為國效力。受到火野葦平等作家實際行動的支撐、刺激，在寫作老師指引到台灣擔任雜誌編輯，精神因此獲得救贖，成家立業並接受第二國民兵訓練，逐漸擺脫親子間的陰影重獲新生。戰爭、戰爭文學作家與殖民地文學活動的結合，使陰鬱憤懣、體質柔弱的日本青年變得積極努力接受挑戰，對殖民地人民有戰爭啟蒙與宣傳的意義。全文沒有國策宣傳的套語，主人翁以戰爭為量尺審視親情、文學與人生的意義，一切因為可能隨之而來的徵召，期待著在戰場上生出偉大的作品，戰爭被美化為小說人物的人生出口。

星名宏修<sup>31</sup>研究指出紺谷淑藻郎先看過火野葦平《海南島記》而寫出了〈海口印象記〉<sup>32</sup>，火野對於在占領區大撈一筆的惡劣日本人表示反感，〈海口印象記〉中攝影師壯吉也發現 Y 洋行老闆準備開設〇〇（娼館）的陰謀，彷彿隨著日軍的行動結果，娼館的開設已是實情，這就是占領區的實況。楊遠在〈臺灣文學問答〉給予〈海口印象記〉極高評價：

在新體制下，在大東亞建設戰爭中，我們期待活躍在海外的人們個個都是建設的勇士。然而這裡所描寫的人們是何等萎靡不振！可是只要這是實情，這種描寫不但不會傷害這部作品，反而會使這部作品更為生動。

<sup>30</sup> 名和榮一，〈遑かなる母に〉，《臺灣文學》2卷4號（1942年10月），頁57-67、179-185。

<sup>31</sup> 星名宏修，〈何謂「海外進出」——試析紺谷淑藻郎《海口印象記》〉從時人楊遠與澀谷精一對紺谷淑藻郎〈海口印象記〉評論的相異點切入，輔以火野葦平的言論，探討大東亞戰爭下外域日本人的形貌，兼論日本「海外進出」的景況，認為楊與澀谷的差異，可視為之後「冀現實主義」論爭的前哨戰。收於《「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竹：國立清華大學，2011年），頁161-189。

<sup>32</sup> 紺谷淑藻郎，〈海口印象記〉，《臺灣文學》1卷2號（1941年9月），頁106-118。

雖然我們憎恨在這部作品中亂搞的人們，但是作者直接大膽地提出這個問題，我們應該要敬佩他。<sup>33</sup>

紺谷淑藻郎並未如火野葦平對「趁兵荒馬亂時大撈一筆的日本人」<sup>34</sup>加以批評，對賣身者的弱者命運心生同情，但又代之以邁向新戰場（廣東）的緊張感。

相對於火野葦平的大陸戰場描寫，紺谷淑藻郎從殖民地經驗進一步思考帝國與殖民地主體的關聯性，〈海口印象記〉中攝影師壯吉在海口遇見同樣來自台灣在 M 洋行工作的楊文通，在沒有其他「內地人」、「本島人」的大陸新天地，壯吉對楊文通倍感親切。然而也在楊文通身上看到醜陋的形象——學沒教養的日本人稱台灣人的話×××××（清國奴）叫當地人，對當地「土人」頤指氣使的優越感，揭露了作為南方指導者的虛妄性。

壯吉以廢墟美形容海口，孩子學日軍陸戰隊練刺槍術、父母親無所謂的表情，令壯吉感受到中國的天高地遠，以及人民對政治的無感。有如火野葦平在《麥田與士兵》中認為戰爭對中國農民而言只不過是場自然天災般，災後又會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似的繼續在這土地上過活（五月十日）。窮苦無告的老百姓任人宰割的無奈，被外來他者視為政治無知。

在海口聚首的日本人言談表現出對台灣水、茶等的懷念，「台灣的內地人無法擺脫對內地紅葉或櫻花的嚮往，對台灣懷有那樣的心情真是難得。」<sup>35</sup>沒有火野與士兵們捨命占取新領地的經驗，作者對大陸新領地的描寫，從自身殖民地經驗對假皇民問題提出批判，而隨著戰場的擴大、軍民的移動，台灣也成為殖民者鄉愁棲止的所在。

收錄在濱田隼雄編的小說集《萩》中嘉納磨佐秋的〈海口女子〉（海口の女）<sup>36</sup>描述海口軍隊治安宣撫班日語講習所教師大信上等兵在海口占領地教授

<sup>33</sup> 楊遠，〈臺灣文學問答〉，原刊於《臺灣文學》2卷3號（1942年7月），頁167；引自黃英哲主編，涂翠花譯，《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3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頁360。

<sup>34</sup> 火野葦平語，見〈東莞行〉，《火野葦平集》（東京：改造社，1940年），頁428-429。

<sup>35</sup> 同註32，頁112-113。

<sup>36</sup> 嘉納磨佐秋，〈海口の女〉，收於濱田隼雄編，《萩》（台北：台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1944年），頁69-98；本文依據中島利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集成4台灣短篇小說集》（東京：綠蔭書房，2002年），頁303-332。

日語所面臨的問題。女子青年教室的女學生長得和台灣女子青年團一樣的臉，令大信吃驚，這種敵我難辨的熟悉感多次出現在《麥田與士兵》中，中國農民的臉龐總是令「我」感到親切熟稔，這或許根基於日本兵來源以農村為多，而火野流露的是父兄當解救子弟的情感，嘉納磨佐秋談的則是殖民經驗在新領地的移植，呈現出更多日本自我中心的思維。

然而令大信驚怒的是女學生以對「支那兵」的態度看待日本兵，反詰女學生說：

支那是沒用的人去當兵，日本是最好的人去當兵……日本軍隊有大學老師、公司要員、農人、商人等，支那女學校沒教這些嗎？<sup>37</sup>

在軍隊中負責武力占領後皇民教育的大信，藉著塑造帝國士兵高等形象的言論打壓中國女學生，緊接著在瀰漫著復興自治氣氛的海南島，以皇國臣民之眼要求中國人民，在與市民歡迎皇軍入城的融合遊行中，更堅定了大信要盡全力教育中國知識分子成為皇民以謀求東亞民族幸福的信念。退伍後的大信回到台灣執教，仍在夢中勾勒海口市的願景。以皇民教育建設新占領區域的描寫，呈現了繼武力侵略後以日本天皇為價值基準的思想入侵。

西川滿的《台灣縱貫鐵道》<sup>38</sup>是在台日人作品中對士兵捨命占領台灣的過程有較多著墨，可與火野戰爭文學作一對照。這部被西川滿視為「戰意昂揚超越寫實的運用寫實」<sup>39</sup>代表作，以 1895 年台灣反抗日本占據的乙未戰爭為題材。根據前行研究朱惠足指出，西川滿根據文獻中的老照片，發揮想像力復原照片拍攝的經過與現場，觀察主體為攝影記者，其中穿插戰地記者村上的通訊報導與手記，模擬當年日本印刷傳播媒體報導日軍的海外遠征，製造國民想像的過

<sup>37</sup> 同註 36，頁 318-319。

<sup>38</sup> 〈台灣縱貫鐵道〉第 1 至 11 回，自 1943 年 7 月起至 1944 年 12 月止，連載於《文藝臺灣》6 卷 3 期、6 卷 4 期、6 卷 5 期、6 卷 6 期、7 卷 2 期，以及《臺灣文藝》1 卷 1 期、1 卷 2 期、1 卷 3 期、1 卷 6 期、1 卷 7 期。本文所用版本為中島利郎、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第 2 卷，（東京：綠蔭書房，1998 年）。中譯本參考黃玉燕譯，《台灣縱貫鐵道》（台北：柏室科技，2005 年）。

<sup>39</sup> 西川滿，〈文藝時評〉，《文藝臺灣》6 卷 2 號（1943 年 6 月），頁 27。

程<sup>40</sup>。而筆者以為將「旁觀者」與「第一人稱日記體」的組合，呈現出日本近代戰爭文學與媒體的關聯，恰似火野葦平戰爭文學新興的模式。

戰爭觀源自作者的歷史觀，西川滿以殖民者高度強調日本軍人的崇高、秩序與集體美感。敘事者從殖民者的觀點發話時，反抗軍的形象成了「匪賊」、「台灣民主國」成了烏合之卒，敘述者深入「敵軍」——台灣抗日軍，描述內部分化、混亂的情形。這些裝備老舊的反抗者，和擁有「忠烈的士兵、優良的裝備、勤勉的醫官」（《台灣縱貫鐵道》，頁 360）的日本對峙時，在殖民者筆下成了一幕幕落後者自不量力的鬧劇，「毫無道義的為反抗而反抗，難道不知道是自身的不幸？」而且完全不知日本是「為了救臺灣人民而戰」（《台灣縱貫鐵道》，頁 297）。因此日軍的大規模掃蕩「匪賊」，正是為了天子（日本天皇）「救真的良民，令台灣成為皇土」的唯一方法，更直接以日本大義追認戰爭的正當性。

這部由西川滿搜集文獻資料發揮想像力的戰爭描寫，我們不會看到太過誇大表現與戰爭有關的場景或近距離的戰鬥場景。但經常看到「匪賊」主動攻擊，日軍總是被動攻守，砲聲總在遠處，台灣民眾都期待日軍到來。藉由刻劃「匪敵」難纏以突顯即使殖民不易仍有堅定信念的日軍精神。書寫方式符合國策宣傳所需，沒有戰爭的陰暗面，匪敵一律可憎，而日軍是勇敢沉著的正義之士。

日本帝國對西洋先進帝國在台灣勢力的繼承脈絡，在《台灣縱貫鐵道》有了明白的交會轉移，畢特蘭告訴從軍記者村上「到台灣來值得我尊敬的清國人只有一個劉銘傳」（《台灣縱貫鐵道》，頁 181）。當日軍在台北車站發現並修復 1887 年德國製的「騰雲號」時，「八年後的今天，經由兩名日本人著手修理有某種因緣」（《台灣縱貫鐵道》，頁 148），表明台灣現代化建設已由清朝官僚與西洋工程師轉移到日本人手中。德國陸軍中尉舒瑪赫說：

台灣被平定後，也許仍有一部分頑冥之徒謀逆不軌，欲抵抗日本將經營的文明事業。但我認為不必顧忌那種事。日本政府毅然保全歷史上獲得的此一大榮譽，在撫育住民下，必然從相信日本尊敬日本的住民中，編

<sup>40</sup> 朱惠足，〈帝國主義、國族主義、「現代」的移植與翻譯：西川滿《台灣縱貫鐵道》與朱點人《秋信》〉，《中外文學》33 卷 11 期（2005 年 4 月），頁 117-118。

成活躍有為的軍隊，由住民自動向日本政府負起義務。到那時與住民服從支那官吏壓制下的時代完全懸殊的繁榮將降臨台灣。（《台灣縱貫鐵道》，頁 361）

藉由友邦之口從文明教化的角度強調日本統治台灣的正當性，更預言台灣人民「志願從軍」的必然性，以正當化半世紀後在殖民地台灣所進行的異族軍事動員。

由於鐵路與戰爭補給關係密切，日軍一登陸台灣即組成鐵路調查隊進行勘查，日本不單只是取代清朝劉銘傳與德國工程師的地位，鐵路技師小山保政以專業形象批評獅球嶺結構不安全（《台灣縱貫鐵道》，頁 140），認為工程上的不合理出於清國政府躁進政策的干擾（《台灣縱貫鐵道》，頁 264），並強調台灣舊有的鐵路不僅止於新竹而已，在「匪賊」蓄意破壞下舊有的也殘缺不全，重申建設台灣縱貫鐵道對日本殖民統治的重要性。而「匪賊」的破壞不僅妨礙日本「解救台灣」，也是反抗台灣的現代化建設，因此為了台灣的現代化，必然要掃蕩匪徒，「現代化」名正言順的成了殖民者統治台灣的動機與理由，而日本民族的傳統則是台灣唯一的歸向，朝向打敗中國、超越歐美邁進。

日軍攻台時因熱病喪命的人數多過戰死者，其中還包括日本皇族北白川宮能久，顯示一踏上殖民土地，任誰都逃不過「台灣熱」——瘧疾的襲擊，軍醫部長森林太郎認為如果不改變市街結構、房舍樣式，要遏止傳染病好比待黃河清（《台灣縱貫鐵道》，頁 186），從醫療衛生的角度暗示日本殖民政權將超越台灣的文化傳統，公共衛生也成為殖民者建設現代化台灣的一環。德國陸軍中尉舒瑪赫認為日本擁有與德國不相上下的軍醫，而且不僅盡忠職守的醫治本國的傷兵，對遭賊徒槍擊負傷的本地居民也細心治療（《台灣縱貫鐵道》，頁 359），預言：「日本的軍醫們必定在不久的將來，把台灣從不健康的土地改變成東洋的寶庫。」（《台灣縱貫鐵道》，頁 360）這裡「台灣」成為等待日本殖民宗主國解救的瘡痍之地，日軍不再是不行仁慈、專主殺伐的侵略者，而是使台灣良民恢復更生的再造者。

這部長篇小說於雜誌連載時，以「白露の章」作副標題，但並未完成「縱貫」的題旨。三十四年後（1978年）發行《台灣縱貫鐵道》單行本時，西川滿

在後記說明當年已計畫撰寫「連霧の章」，內容將延伸至縱貫鐵路全線開通，然而不知為何沒完成<sup>41</sup>。台灣光復後，成為戰敗國一員的西川滿，曾因擔任台灣文化最高指導者被列入舊台灣總督府情報課提出的戰犯名單中<sup>42</sup>，或許回到日本的西川滿，當「個人的台灣」與「殖民帝國」漸漸成為歷史時，卻失去了縱貫創作台灣歷史小說的動力。決戰時期的台灣成為在台日人筆下審美的對象，以一個不存在的台灣來追求因戰爭被美化為具有崇高價值和道德力量的日本精神傳統，藉以引起高昂情緒，使日台人民朝向國家一體感覺，台灣文學成了推動大眾動員維持戰爭的媒介<sup>43</sup>。

在法西斯國家裡，個人的價值因團體或組織具有意義，今田喜翁〈再生〉<sup>44</sup>敘述在黑市進行鐵皮交易的吉崎，在乘偽行詐中日漸喪失了自我，走在路上遠處傳來了〈太陽旗進行曲〉（日の丸行進曲），接著迎面而來的白衣勇士（傷兵）們，他們清晰的輪廓加上拄著的拐杖發出的金屬聲，在吉崎的心中幻化成堅定的聲音，皇軍的歌聲與足音洗滌了他渾濁的精神<sup>45</sup>。作者藉著觀看戰爭帶來的視聽覺感受，賦予了主角重生的可能。如果能接受徵召入伍，整個人的價值將提昇至偉大的層次，就如今田喜翁〈掘泥船〉（浚渫船）<sup>46</sup>中的操作員啓吉，在接到兵單後，感覺在高雄的一小塊土地上建設，是多麼偉大的時刻，因而產生了人機一體的人生觀——人死船在，船毀人亡<sup>47</sup>。主角如此激昂的精神，似乎宣告著：在戰爭現實中，個人的價值依附在國家價值底下，人成為國家機器的部分，如機器般運轉，機器的價值要大於個人，戰爭被美化了，士兵操作的兵器也充滿了美感，賦予了武器不凡的力量。

在侵略戰爭中，小我的情感被放進國家機器裡絞軛，個人的情感必須依附於以天皇為中心的國體，在收音機前聽取戰果時，不論成敗主角皆因此流下悲

<sup>41</sup> 參考中島利郎，〈西川滿作品解說〉，同註 38，頁 411。

<sup>42</sup> 參考中島利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小事典》（東京：綠蔭書房，2005 年），頁 86-87。

<sup>43</sup> 以上觀念受崔末順研究啟發，參考〈戰爭時期台灣文學的審美化傾向及其意義〉，《海島與半島：日據臺韓文學比較》（台北：聯經，2013 年），頁 331。

<sup>44</sup> 今田喜翁，〈再生〉，《文藝臺灣》6 卷 4 號（1943 年 8 月），頁 50。

<sup>45</sup> 同註 44。

<sup>46</sup> 今田喜翁，〈浚渫船〉，《文藝臺灣》6 卷 2 號（1943 年 6 月），頁 9。

<sup>47</sup> 同註 46。

欣之淚，如濱田隼雄〈畜生〉<sup>48</sup>、小林井津志〈監視臺〉<sup>49</sup>。而鶴丸詩光〈轟炸與白金〉（空爆と白金）<sup>50</sup>描寫多愁善感的姐姐秀英，遲遲不願將母親遺物中的白金戒指捐作國防用<sup>51</sup>，純真奉公的弟弟昭賢反而教訓姐姐：「現在不是拘泥小我感情的時候了，姐姐難道沒有忠誠心嗎？」<sup>52</sup>緊接著十天後的大轟炸，秀英的家因此化為灰燼，所幸人員避難防空洞安然無恙。秀英為平白損失的白金戒指而自責為「非國民」（不愛國者）時，昭賢才笑笑道出背著姐姐捐出白金的事，弟弟要姐姐看著天空的飛機說：「母親的戒指現在已經不一樣了。」秀英為自己有個像兄長般的弟弟感到欣慰，之前的憂愁與不安也一掃而空，而時時追隨著飛機的身影。小說中描寫姐弟情以及化小我為大我的精神生動細膩，然而人性的良善面成了非人性戰爭的共犯，作者完成的正是協助殖民當局合理化戰爭帶來的災難及困苦，透過不斷重覆此一理念，協助人民克服為國犧牲的精神干擾，達到戰爭宣傳的要求。至於破壞國家精神總動員或干擾為國犧牲精神的個人情感是不容許的，此種非理性的衝動導向了對死亡的崇拜。

在國體論下個人的價值在於成為國家的一部分，從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觀點來看，我們才能了解為什麼在台日人作家不只寫作鼓勵台灣人成為志願兵的小說<sup>53</sup>，還必須處理「無法當兵」的議題。日本的戰爭宣傳強調國民的犧牲與榮譽的重要，以此要求全民一致支援戰爭，可說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影響。戰爭文學中充斥著視死如歸、輕死重名的思維，不能為國犧牲便無法彰顯個人的價值，身為日本人如果無法上戰場就會有喪失自我價值的痛苦。1943年2月發表

<sup>48</sup> 濱田隼雄，〈畜生〉，《臺灣文藝》1卷6號（1944年12月），頁24。

<sup>49</sup> 小林井津志，〈監視臺〉，《臺灣文藝》1卷6號（1944年12月），頁29。

<sup>50</sup> 鶴丸詩光，〈空爆と白金〉，《臺灣文藝》1卷6號（1944年12月），頁35。

<sup>51</sup> 為了武器增產所需，1943年台灣總督府根據〈國家總動員法〉「金屬類回收令」，下令進行貴金屬回收。1944年9月11日至11月4日訂為白金繳納日，如未確實繳交將受嚴重處分。11月13日還聚集婦女，為沒有生命卻可能有特別意義的白金、鑽石舉行送別會。回收物資範圍之廣，可見日本當時物資之困乏。參考竹中信子，《殖民地台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昭和篇下》（東京：田畑書店，2001年），頁290。

<sup>52</sup> 同註50。

<sup>53</sup> 在台日人小說中川合三良〈出生〉、新田淳〈池畔的家〉、新垣宏一〈沙塵〉、土井はる〈落磐〉、小林井津志〈蓖麻成長〉等，皆以鼓勵台灣人成為志願兵為題材，必須要處理的是如何說服不同血源文化的台灣人為天皇盡忠義、為日本帝國獻生命，具有呼應國策的宣傳意義，但尚無法從日本傳統精神的角度自圓其說這條使「異族」成為日本人的「捷徑」。

的大河原光廣〈調職〉(轉勤)<sup>54</sup>，描寫大阪師範畢業的乃布，因為關節方面的疾病，臥病五年，選擇到有益於腳疾的炎熱台灣，任教於台南偏遠的小學。再次接到兵單的他激動而興奮著，三年前曾接受徵召的乃布，當時出征前，學校、庄、郡都舉行了盛大的送別會、祈願式，父親也從日本打電報來祝賀。乃布卻因腳疾無法快走，入營當天就遭撤回，那次失敗後面對鄉親的痛苦心情至今仍心有餘悸，使得他這次再怎麼樣也想要入伍。但結果仍被打回票，傷心難過的乃布幾乎沒有勇氣回家<sup>55</sup>。河野慶彥〈藍色玻璃珠〉(とんぼ玉)<sup>56</sup>中，第一次應召遭撤回的佐伯，再次接到兵單時，採取不告而別的方式，其間的心裡轉折，作者透過佐伯創作的小說〈母親的信〉(母の手紙)托出，因痔疾而到熱帶南方來的「我」：

接到召集令時覺得自己是多麼幸福，但也僅止於此，我從營門提著奉公袋垂頭喪氣的回去時，非常想死。一想起送別會的夜晚、公司同事或朋友時，真不知要以何種面目回去。但還是回去了，老板及同事們的安慰，令我更覺得空虛。<sup>57</sup>

等待入伍上戰場的心情從高昂到沮喪、慚愧，除了是順應國策呼告的表現，也源於無法實踐日本民族神國觀念和天皇崇拜的群體意識，因而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感，人性在戰爭中遭受壓抑，每個人都變得非常相似，趨向機械化的一致性發展，用以面對新的戰爭危機。

曾於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中強烈主張：「皇民文學的內容必須是國體性、決戰性」的神川清<sup>58</sup>，1944年5月發表的〈墓前報告〉<sup>59</sup>，藉著即將出征的「我」

<sup>54</sup> 大河原光廣，〈轉勤〉，《文藝臺灣》5卷4號(1943年2月)，頁51-61。

<sup>55</sup> 同註54，頁55-59。

<sup>56</sup> 河野慶彥，〈とんぼ玉〉，《文藝臺灣》7卷2號(1944年1月)，頁87-103。

<sup>57</sup> 同註56，頁100。

<sup>58</sup> 參考《文藝臺灣》終刊號(1944年1月)，頁34。神川清曾點名楊遠無知又不用功(頁58)，批評有人在台灣文壇進行不適當的文學活動(頁43)，應是針對台籍作家發言。他在同期雜誌上發表了〈皇民文學の樹立〉，大聲疾呼：「在此決戰態勢之下，我等思想決戰陣營的戰士，必須撲滅非皇民文學，並揚棄非決戰文學不可……唯有透徹明白皇國體制，內容滿溢建設之喜悅的作品，才可以稱得上是最健全的作品。最後，我想斷言的是，壯烈之決戰的戰鬥意志，其源泉正是我們的開國精神。」(頁44)。中譯引自黃英哲主編，邱香凝譯，《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4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

在恩田隼人夫婦墓前，報告領養遺族一郎和二郎以來二十一年的成長過程。一郎中學畢業後赴日本求學，二郎完成中學學業後，志願到有台灣人學生的國民學校任教。他一面教導學生「凡對天皇陛下有益之事立即實行」，自己也以身作則身體力行，但卻失望於學校的道德教育尚未深植奉獻皇國的信念。直到大東亞戰爭爆發，二郎焦慮的情緒才找到了出口，申請成為航空兵，最後與敵機同歸於盡，完成了其始終如一的信念，「我」認為是唯一對得起恩田隼人的驕傲。文末一郎和「我」，父子二代將追隨二郎的腳步接受徵召<sup>60</sup>。全文充滿皇民盡忠大義的呼喊，實踐了神清川自己的皇民文學、決戰文學主張。有形的軀體透過「聖戰」洗禮獻祭予國家，合乎忠義之行而獲得名譽，而這種忠孝一致的思想，強調犧牲與榮譽的重要，符合日本武士道精神，是日本戰爭宣傳所強調的。然而小說中二郎感到失望的國民學校「不澈底」的道德教育，顯示了日本國家至上、民族優越感以及武士道精神的思維模式，逐步走向法西斯主義的行動，並以此要求殖民地人民卻造成無法彌補的罅隙。

女性雖然未實際參與戰爭，但在父之家國的理想中，要以成為勇敢的軍國之妻、聖戰中的聖女自許，以通往大東亞共榮之路。河野慶彥 1943 年 7 月發表的〈燒水〉<sup>61</sup>（湯わかし）藉著家政女學校年級主任教師的話說道：

現在是大東亞建設的偉大皇軍戰鬥的時刻，男子盡全力在前線或增產報國中戰鬥著。今後即使女子也不容許閒居在家，我等非盡全力衝刺完成戰爭不可。各位也是士兵，身為女子要竭盡全力有所作為。<sup>62</sup>

筆者觀察在台日人小說戰爭書寫中的女性表現多集中在描寫日本女性，一方面可能因於觀察點尚未深入志願兵的婚姻層面，再者描寫作者熟悉的日本人，也同時完成了皇民化運動中以日本人為榜樣的目標。河野慶彥的〈燒水〉雖然描寫的是台灣女學生畢業後發展，但因全文充斥著對皇民教育成功的歌頌，使得

---

處，2006 年），頁 426。

<sup>59</sup> 神川清，〈墓前報告〉，《臺灣文藝》創刊號（1944 年 5 月），頁 36-45。

<sup>60</sup> 同註 59。

<sup>61</sup> 河野慶彥，〈湯わかし〉，《文藝臺灣》6 卷 3 號（1943 年 7 月），頁 46-62。

<sup>62</sup> 同註 61，頁 49。

小說中台灣女性的形象和日本女性的差別，似乎只在於中式姓名和低階職位，顯示出在台日人作家只寫皇民化台灣人的偏失。

所謂「營門通往戰場，戰場通往靖國神社」<sup>63</sup>，戰爭對女性生活的影響是殘酷的，留下的痛苦是漫長的。山川不二人 1942 年 7 月發表的〈半旗空中高高掛〉<sup>64</sup>（弔旗中空に高く），在鄉軍人「我」的母親擔憂女兒要遠嫁滿州，「我」的妻子說：「現在非常時期，嫁誰結果還不都一樣」<sup>65</sup>。吉村敏同年 11 月發表的〈軍事郵件〉<sup>66</sup>（軍事郵便）出征軍人恒太郎在小姨子訂婚日時忠告新人：

在大喜日說這些雖然不太吉利，但對於未來料想得到的悲傷，一定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這是現代日本人年輕人訂婚或結婚時必備的常識。不那樣的話，信夫就無法充分完成軍人的功績。所以那是愛信夫最好的方式。<sup>67</sup>

道出了出征家庭的共同無奈，然而面對戰爭給各個家庭造成的悲劇，日本人選擇沈默以對。〈半旗空中高高掛〉在鄉軍人「我」到喪家慰問未亡人，承諾往後會好好照顧遺族，未亡人面無表情的說著：「不，外子即使因為戰死，也不該依賴後方各位的。外子只不過做了該做的事而已。」<sup>68</sup>這類近乎無情冷酷的描寫，反映了日本對個人感情的處理以壓抑為上的傳統，這是源自武士道中「克己」的精神，新渡戶稻造解釋武士不把感情表露於外，「喜怒不形於色」才是模範，無論男女，即使靈魂感到激動也必須靜靜壓抑著：

勇氣的鍛鍊是對任何事不抱怨，培養忍耐的精神；禮的教訓是不要因為表露自身的悲哀或痛苦而妨礙到他人的快樂或安靜。<sup>69</sup>

<sup>63</sup> 濱田隼雄，同註 36，頁 243。

<sup>64</sup> 本文依據山川不二人，〈弔旗中空に高く〉，《臺灣文學》2 卷 3 號（1942 年 7 月），頁 29-42。原文為日文，中文為筆者自譯。

<sup>65</sup> 同註 64，頁 32。

<sup>66</sup> 本文依據吉村敏，〈軍事郵便〉，《臺灣公論》11 月號（1942 年 11 月），頁 95-98。原文為日文，中文為筆者自譯。

<sup>67</sup> 同註 66，頁 96。

<sup>68</sup> 同註 64，頁 41。

<sup>69</sup> 新渡戶稻造著，林水福譯，《武士道》（台北：聯合文學，2008 年），頁 97-99。從這個觀點來討論坂口禊子 1943 年 4 月發表的〈燈〉（《臺灣文學》號，頁 2-25），尾崎秀樹認為

戰爭已被美化為富有生命力，為國犧牲也被崇高化，小說在沿路行人對這無言遺骨送行隊伍的注目禮中結束，只有象徵武勳的半旗翻飛飄揚在空中。全文不見歌頌戰爭、美化陣亡的語言，從自我犧牲到自我超越、昇華，沒有個人情感，只有民族共同體勝利的幻想。

## 五、結語

為了解戰爭期在台日人戰爭書寫的歷史脈絡，本文透過日本「內地」作家作品火野葦平《麥田與士兵》的戰爭美學，觀察決戰時期在台日人作家在國策領導文學的政令要求下，如何寫作歌頌鼓舞戰爭的作品，逐步邁向和日本內地文學同步的目標。藉此了解殖民母國對殖民地文學的影響，以及身處殖民地的殖民者作家的特點。

面對不同時空下的文學比較，筆者採取戰爭美學化觀點，從法西斯主義美學分析火野葦平《麥田與士兵》中的藝術化辭令，看出火野在決戰時期文學場域如何滿足了軍方、媒體及讀者的需求，成為協力戰爭文學的代表作。

火野葦平以文壇戰士之姿現身殖民地台灣，藉由文學、演說以及原著改編電影，協助戰爭宣傳的行動深植人心。以火野葦平《麥田與士兵》戰爭美學化策略考察 1941 年起開始大量出現的在台日人戰爭宣傳小說，由殖民地經驗出發，充滿著統治者知識階層對台灣人的教化意識，以及加強在台日本人軍事化體制下的一致性意圖，出現了火野戰爭文學手法的在地化敘事，文學創作成為強化殖民地理想皇民的工程項目，呈現再生產日本殖民主義擴張下強制同質化的問題，殖民地無法擺脫日本帝國的民族傳統意識與日益強化的國家主義的鉗

---

坂口禊子沒有刻意弄一句國策性語言，避開虛設而聚焦在戰爭帶給女性的悲哀。尾崎秀樹著、陸平舟、間ふさ子共譯，《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台北：人間出版社，2004年），頁197。井手勇認為題目「燈」有重要含意，結局沒有批判戰爭的用意，只要國家不滅，丈夫以至後世子孫皆得永存。妻子「我」為了克服悲哀，相信丈夫參與的是一場聖戰，送走丈夫就是女性對聖戰的一種貢獻，作品如實呈現戰爭帶來的種種苦惱，重在克服苦惱的過程。（前引書，頁143-145）國策文學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勇敢、堅忍、犧牲、克己的傳統精神，以及麻木、順從與不抵抗的法西斯精神，卻讓〈燈〉中的妻子「我」經歷了內心多重的掙扎、轉折，甚至在神殿前禁不住嚎啕大哭起來。筆者認為坂口禊子對人物心理變化的掌握與刻劃，是作家誠實的表现。雖然最後仍臣服於萬世一系帝君，但在無法批評戰爭的時代氣氛下，作家表現出不同流的態度。

制，台灣文學也要朝向「汲取古典精神的道統，傳承自淨瑠璃的義理人情感性的日本文學」<sup>70</sup>發展。

在總力戰下帝國與殖民地日本作家在協助戰爭、文學奉公上，朝向以傳統精神來合理化、美化戰爭帶來的災難及困苦，協助人民堅定為國犧牲的信念，作家作為國家組織的一員，個人情感被貶低剝奪，順從國家最高統治者與戰時體制，文學想像力從屬於軍事價值，在軍事化檢閱系統中形成自我檢閱機制，一切朝向法西斯主義化邁進，戰場上種種侵略的、殘酷的暴行掩藏在美麗的和服內，不論是非只求勝利的非理性思考模式充斥著小說，壓抑個人、肯定犧牲、讚許榮譽，使文學朝向政治化發展。今日閱讀此類戰爭文學時，除了藉此了解左右日本人思考與行動的精神原理，對於日本作家缺乏自身政治性、社會性立場認知下的失心狀態，也應有所警惕，並不忘省思戰爭對文化與人心的斷喪。

<sup>70</sup> 新垣宏一，〈「台灣決戰文學會議」紀錄〉，《文藝臺灣》終刊號（1944年1月），頁32。

## 參考資料

### 一、小說文本

- 大河原光廣，〈轉勤〉，《文藝臺灣》5卷4期（1943年2月）。
- 山川不二人，〈弔旗中空に高く〉，《臺灣文學》2卷3期（1942年7月）。
- 小林井津志，〈監視臺〉，《臺灣文藝》1卷6期（1944年12月）。
- 火野葦平，《火野葦平集》，（東京：改造社，1940年）。
- 今田喜翁，〈浚渫船〉，《文藝臺灣》6卷2期（1943年6月）。
- ，〈再生〉，《文藝臺灣》6卷4期（1943年8月）。
- 西川滿著，黃玉燕譯，《台灣縱貫鐵道》（台北：柏室科技，2005年）。
- 吉村敏，〈軍事郵便〉，《臺灣公論》11月號（1942年11月）。
- 名和榮一，〈遐かなる母に〉，《臺灣文學》2卷4期（1942年10月）。
- 河野慶彦，〈湯わかし〉，《文藝臺灣》6卷3期（1943年7月）。
- ，〈とんぼ玉〉，《文藝臺灣》7卷2期（1944年1月）。
- 尾崎士郎、火野葦平著，谷崎潤一郎等編，《日本の文学》第51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68年）。
- 神川清，〈墓前報告〉，《臺灣文藝》創刊號（1944年5月）。
- 紺谷淑藻郎，〈海口印象記〉，《臺灣文學》1卷2期（1941年9月）。
- 嘉納磨佐秋，〈海口の女〉，收於中島利郎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集成4台湾短篇小説集》（東京：綠蔭書房，2002年）。
- 濱田隼雄，〈畜生〉，《臺灣文藝》1卷6期（1944年12月）。
- 鶴丸詩光，〈空爆と白金〉，《臺灣文藝》1卷6期（1944年12月）。

### 二、日據時期雜誌、報刊

- 《文藝臺灣》，臺灣文藝家協會、文藝臺灣社，1940年1月至1944年1月。
- 《臺灣文學》，啟文社，1941年5月至1943年12月。

《臺灣文藝》，臺灣文學奉公會，1944年5月至1945年1月。

《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日日新報社，1898年5月至1944年3月。

《風月報》，風月俱樂部、南方雜誌社，1937年7月至1941年6月。

### 三、專著

#### (一) 中文

井手勇，《決戰時期台灣的日人作家與「皇民文學」》(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1年)。

尾崎秀樹著、陸平舟、間ふさ子共譯，《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台北：人間出版社，2004年)。

崔末順，《海島與半島：日據臺韓文學比較》(台北：聯經，2013年)。

陳思廣，《戰爭本體的藝術轉化——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戰爭小說創作論》(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

華特·班雅明著，許綺玲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1998年)。

黃仁，《日本電影在臺灣》(台北：秀威資訊，2008年)。

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3、4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

新渡戶稻造著，林水福譯，《武士道》(台北：聯合文學，2008年)。

潘乃德著，黃道琳譯，《菊花與劍——日本民族的大化模式》(台北：桂冠圖書，1974年、1987年)。

蘇珊·桑塔格著，廖思逸、陳耀成、姚君偉譯，《土星座下》(台北：麥田出版，2007年)。

## (二) 日文

-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小事典》（東京：綠蔭書房，2005年）。
-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集成 4 台灣短篇小說集》（東京：綠蔭書房，2002年）。
- 中島利郎、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第2卷（東京：綠蔭書房，1998年）。
- 市古貞次編，《日本文學全史》第6卷（東京：學燈社，1994年）。
- 池田浩士，《火野葦平論》（東京：インパクト出版會，2000年）。
- 安田武，《戰爭文學論》（東京：勁草書房，1964年）。
- 竹中信子，《殖民地台灣的日本女性生活史・昭和篇下》（東京：田畑書店，2001年）。
- 紅野敏郎、三好行雄等編，《昭和の文學》（東京：有斐閣，1992年）。
- 鳥海一郎，《戰爭と芸術の課題》（京都：教育圖書株式會社，1942年）。
- 櫻本富雄，《日本文學報国会——大東亞戰爭下の文學者たち》（東京：青木書店，1995年）。
- ピーター B. ハーイ，《帝國と銀幕》（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1年）。

## 四、論文

### (一) 中文

- 朱惠足，〈帝國主義、國族主義、「現代」的移植與翻譯：西川滿《台灣縱貫鐵道》與朱點人《秋信》〉，《中外文學》33卷11期（2005年4月），頁111-140。
- 星名宏修著、黃舒品譯，〈何謂「海外進出」——試析紺谷淑藻郎《海口印象記》〉，《「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竹：國立清華大學，2011年）。

## (二) 日文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研究——日本人作家の抬頭——西川滿と「台湾詩人協会」の成立〉，《岐阜聖徳学園大学紀要・外国語学部編》第44集（2005年2月），頁43-54。

河田和子，〈報導戰線下における戦争の表象——火野葦平《麥と兵隊》の表現戦略〉，《昭和文學研究》第45集（2002年9月），頁55-66。

花田俊典，〈火野葦平、戦争文学の誕生〉，《昭和文学研究》第44集（2002年3月），頁50-63。

坪井秀人，〈戦争短歌における前線と銃後——《支那事变歌集》その他〉，收於山口俊雄編，《日本近代文学と戦争——「十五年戦争」期に文学を通じて》（東京：三弥書店，2012年），頁83-118。

後藤康二，〈《麥と兵隊》における個と類の問題〉，《近代文学研究》第19期（2002年5月），頁55-67。

蒲豊彦，〈一九三八年の漢口（四）火野葦平と石川達三〉，《言語文化論叢》第5期（2011年8月），頁19-32。

## 五、學位論文

李建璋，〈戰時體制下之木下惠介《陸軍》（1944）及（反）現代性之理論：美學與歷史關係〉（台南：台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柳書琴，〈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4年）。

